

劳动教育怎样“动”起来

■本报记者 温才妃

临近“五一”劳动节,汕头大学生物技术专业大三学生李艾欣却感觉“心里空落落的”。

她回忆起那个吹着咸咸海风的云澳镇,海水一浪一浪地亲吻着她的脚踝。她和同学以及一些中学生提着袋子,弯腰将海滩上塑料袋、易拉罐、泡沫等垃圾一一拾起。这是她一年前参加“走向海洋”课程中“净滩”活动的场景。当天,他们不仅“劳其筋骨”,还在教师的指点下丰富了与海洋污染相关的知识。

“从前我们对普通劳动者的关注不多,但是那次通过与卡车司机、渔村服务员等人打交道,我们更能理解和体会了他们的艰辛,对于各种职业的尊重也发生了正向改变。”李艾欣说。

不久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充分认识新时代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对加强劳动教育的新要求。普通高等学校要明确劳动教育主要依托课程,其中本科阶段不少于32学时。除劳动教育必修课程外,其他课程结合学科、专业特点,有机融入劳动教育内容。

李艾欣突然明白,“空落落”不只是因为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好久没见到师长、同学了,还在于自己留恋劳动带来的幸福感。这个“五一”,她打算做点什么。

与时俱进的劳动教育

小时候,由于浪费粮食,李艾欣的父亲把她送到农村干农活,让她体会了“粒粒皆辛苦”的道理。长大后,她参加学校组织的实践课程,在劳动中丰富了理论知识。

一个人的劳动教育尚且随着年龄增长有所不同,更不用说一个民族的劳动教育,也是与时俱进的了。

1950年,教育部原副部长钱俊瑞在《改革旧教育,建设新教育》报告中,在国内最早提出了“实行教育与生产结合”的教育工作要求。

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教育中心主任曲霞介绍说,劳动教育真正大规模的开展,是在该报告发布后的四五年间。那时,新中国百废待举,各方面生产建设急需人才,同时,学子们也渴望知识的浇灌。这就导致当时社会出现了志向升学而不愿意就业的现象。为了促进毕业生早点投入国家的生产建设,劳动教育成为当时的急需。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受到时代以及理论的局限,这一时期的劳动教育存在过于强调“生产劳动”问题,家庭日常劳动并没有被当作一种劳动。

“大跃进”时期,特别是“文革”时期,劳动教育表现出浓厚的政治运动色彩,大搞工学农学军、上山下乡运动,严重冲击了学校的正规教育体系。“文革”结束后,经过邓小平同志的拨乱反正,全社会树立起了“脑力劳动也是重要的劳动形式、知识分子也是重要的劳动者”的基本观念。

只是在后来德、智、体、美、劳五育发展中,天平逐渐倒向了“智”。高校中逐渐出现了另一种倾向——不重视劳动。实习、实训走过场、流于形式的现象越来越多。

与此同时,在时代发展中,我国的产业格局也发生了较大转变。据2019年发布的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显示,自2004年首次开展全国经济普查的15年间,我国第三产业成为了带动经济增长、吸纳就业人员的主要力量。其中,尤其以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引领的新兴生产性服务业市场主体增长迅猛。

此次《意见》将劳动分为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三种,这在汲取历史经验基础上取得了根本性进步,呈现出新时代劳动教育的特点。对此,有学者表示:“在人工智能时代,劳动必须承担的直接创造财富的功能越来越弱化,劳动与生产的关系也将弱化,这可能是新时代的特征。”

新时代劳动教育是什么

针对新时代劳动教育的定位问题,《意见》明确了将劳动教育作为新时代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新要求,所谓“建设”与“劳动”不分开。

对此,北京某高校教育学院教授李东认为,新时代的劳动应具有两个核心因素:第一,劳动必须动手和动脑紧密结合;第二,劳动必须面对真实现象、真实世界而非幻象。

古时晋惠帝闻民间饥荒,曾建议百姓“何不食肉糜”。在互联网时代,不少青少年也沉迷于在游戏世界中开疆拓土,一方称雄。“不了解世界的真实,会导致一个人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所谓的‘实事’,必须是真实的存在。劳动将促进儿童和青年从幻象中返回真实,面对‘实事’去求‘是’。”李东说。

当下,并不能简单地把劳动理解为生产劳动。比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很多北京大学的学生志愿者在中国疾控中心进行志愿活动时,其主要的工作就是数据统计。从表面上看,这种工作并没有生产出实际



郭刚制版

可见的产品,但他们的劳动却是典型的服务性劳动。

“与中小学的家务劳动、学校综合实践课程相比较,大学的劳动教育特征是真实劳动和创造性劳动。”有从事劳动教育的教师表示,典型的一种创造性劳动是具有高度探索性的本科生产科学研究课程,田野研究、工厂实训、金工实训中,学生动手实践,出力流汗,体力与脑力相结合,应该是大学劳动教育课程的一部分。

苏联教育学者苏霍姆林斯基曾强调,学校教育的主要任务,就是让学生做好参加劳动的准备,这绝不是一个传授知识和技能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在道德上做好劳动的准备,即热爱劳动,对某种劳动形成一定经验,能够自觉地参加劳动,并且有意识地确定自己未来从事某种劳动的志向。

在曲霞看来,新时代劳动教育的内涵至少表现为三个层面——

通过劳动的教育,即让学生参加劳动实践进行锻炼的教育,比如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等。

关于劳动的教育,即引导学生全面、正确地认识劳动的教育,比如听劳模报告、形成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等。一些乱象亟待劳动去改变,比如坐享祖辈家产的年轻人,并不认为自己需要劳动,也不将劳动者的付出放在眼里——一些人随意辱骂快递员、外卖小哥,个人讽刺抗疫工作者,还有一些毕业生频繁不负责任地跳槽,给企业带来了诸多不便……这些都离不开正确劳动价值观的引导和合法劳动、诚实劳动意识的树立。

为了劳动的教育,即让学生真正做好参加劳动的准备的准备教育,比如在大学生的专业学习中强调劳动的目的。曲霞指出,很多时候学生把学习知识理解为应付考试,不知道为什么要学习知识,所学知识可以为国家、社会做什么样的贡献,以至于认为学习和劳动是两码事。

“部分青少年出现不珍惜劳动成果、不想劳动、不会劳动的现象,正是劳动准备不足的典型表现。”曲霞说。

探索刚刚起步

在国内,由于劳动教育刚刚开始强调,高校都在积极探索过程中。

北京林业大学校长安黎哲指出,目前我国高校劳动教育普遍存在的问题是,课程体系建设不足、师资队伍建设不足、内容

与形式缺少规范和标准。

在这方面,国内某些农业院校有过相关探索,比如自1958年建校起,浙江农林大学就把劳动课设为学校的必修课,学习使用锄头等工具是当时农林学子必须掌握的技能。随着时代变迁,该校劳动课的形式也发生转变,转为让学生参与校园绿地管护、学生农作园、暑期驻村等形式。

农业院校的劳动之外,更广泛的高校劳动教育又该如何开展?

“劳动教育显然不能‘一刀切’。”曲霞指出,理工类专业可以结合专业实验、生产实习、科技竞赛等,基于产教融合开展创新性劳动;人文、社科类专业可以推广服务性学习,发挥志愿服务等劳动实践活动的育人价值。

以汕头大学自2010年开设的公益课程为例,该校在课程中融入了对学生的劳动教育,成为全国高校中唯一一所以课程形式落实劳动教育的综合性大学。

这种在欧美及我国香港地区盛行的服务学习课程,并不是简单地在课堂上学习理论,而是通过在“服务中学习,在学习中服务”的理念,让学生进行体验式学习。

李艾欣所上的“走向海洋”课就是其中的环境保护类课程。此外,还有人文关怀类、知识技能发展类、宣教类、历史传承类、综合类等五大模块,近百门课程。

“在公益课程的实施过程中,师生们会先去社区了解相关需求,回校后进行方案设计,方案中所需的知识在课堂中学习,然后回到社区开展服务。返校后,学生再进行反思、交流、沟通和评价,如此才算完成一门课程。”汕头大学教务处处长蔡映辉解释说。

在她看来,高校劳动教育应做体系化统筹设计。“只有形成了体系,高校才会予以重视,而不是像一阵风,志愿服务做完就停止了。学生的劳动意识、劳动观念养成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从基础内容到专业知识,再到实地服务,这样才能真正形成劳动者的品质、精神。”

她补充道,高校要结合自身特色开展劳动教育,体现区别于中小学的“智慧”特征,包括学生有创造性、有反思的劳动,教师对于劳动本身的研究,以及高校对劳动文化氛围的营造。

劳动教育旨在培养社会责任感、奉献精神、吃苦耐劳、实事求是等精神,在某种程度上,与双创教育有着某些相似之处。如何区分二者?蔡映辉认为,双创教育体现了动手动脑,与劳动教育有相当一部分交集,但如果只是停留在文案的策划或文献的研究、数据的统计,没有到实践中去应用,那

还不属于劳动教育。

专业教育与劳动教育需“调和”

“目前开展劳动教育最大的问题依然是观念。在‘五育’中,‘德育’学校重视多年,如今要求重视劳动,不少人并不清楚劳动与其他四育的关系。尤其是在学院层面,引起重视较为困难。”蔡映辉说。

学院重视教育,甚至在一些教师的认知里,劳动很容易被归到德育范畴。“去社区服务要有实践环节,而大学教师多是博士毕业,从理论到理论,让他们参加实践,有时他们会感到麻烦或责任很大,积极性并不是太高。”蔡映辉说。

一些人随意辱骂快递员、外卖小哥,个人讽刺抗疫工作者,还有一些毕业生频繁不负责任地跳槽,给企业带来诸多不便……这些都离不开正确劳动价值观的引导和合法劳动、诚实劳动意识的树立。在人工智能时代,劳动必须承担的直接创造财富的功能越来越弱化,劳动与生产的关系也将弱化。如何结合时代特征,在高校层面开展劳动教育,使得劳动不只是一个口号、一阵风,需要体系化统筹设计。学生的劳动意识、劳动观念养成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从基础内容到专业知识,再到实地服务,这样才能真正形成劳动者的品质、精神。



对此,汕头大学采取的对策是,要求行政教辅人员与专业教师一起开设劳动教育课程,如入职前三年,要求专业教师一定要开设一门公益课程。教师的报酬可以选择课酬形式或计入教学工作量。同时,在承担课程的过程中,还要加强对教师劳动教育的宣传,如对教师以身作则、奉献社会等精神的强调。

“让教师在实践中树立劳动教育的意识,日后即使在专业教育中,如指导学生开展创新创业比赛、学科竞赛时,都能有意识地融入劳动教育。”蔡映辉说。

由于观念、课程体系、师资建设等原因,专业教育与劳动教育更好地融合需要一段时间探索。

李东表示,从劳动视角审视,我国大学教育制度可能还需要做以下变革: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本科生毕业时少有真实劳动经历,为了让他们参与真实劳动,建议他们毕业后直接参加工作,甚至变换工作,在不同岗位中了解世界、了解自己。“这意味着人文和社科领域推免生,至少需要两年真实劳动经历。”

此外,参加成人高考多为有劳动经历者。他建议全国成人高考可以适时与高考合并,本科学历教育中按照完全学分制修读的非全日制教育应逐步扩展。

上述变革与“开环大学”的本质理念相吻合。开环大学是斯坦福大学设计学院提出的一项改革。它解除了入学年龄限制,无论是17岁少年还是已经进入职场中年,抑或是退休后的老人都可以入学,这点区别于传统的四年本科学制。



张端鸿
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

近年来,同行评审是否应该透明化一直是学术界有争议的话题之一。今年2月初,《自然》杂志发表社论文章,宣布其将尝试公开审稿意见,表明学术界已经在努力推动同行评审更加公开、透明的进程。而在破“四唯”、同行评审责任意识亟待加强的背景下,这一努力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在笔者看来,优秀的学术作品是稀缺的。作者虽然是学术生产过程中最为关键的因素,但学术同行审稿人和期刊编辑的作用也不容小觑。

审稿人的作用主要在于为期刊把关,并且针对作品的修改和发表提出建设性意见。在一个规范的学术世界里,不经过同行评审的学术作品一般很难发表,不经过同行评审的期刊也很难被学术共同体所接受。重要的学术期刊索引在考量是否收录期刊时,成为一本同行评审期刊是首要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审稿人是学术生产质量的“守门人”。一流的学术作品背后,往往也有审稿人数月甚至经年努力工作的功劳。

当学术期刊收到一篇学术论文后,一般会同时送给两名审稿人审阅。如果两名审稿人的意见一致,期刊一般会作出与审稿人意见相同的决定。如果两名审稿人意见相左,期刊还会邀请第三审稿人,其意见积极与否将会影响期刊如何作出最终决定。这个学术过程必须是严谨、审慎的。即便是期刊约稿,也必须通过同行评审。如果两名审稿人同时给出负面为主的意见,学术期刊一般也只能给出否决意见。由此可见,审稿人所拥有的学术评审权是不容忽视的。

当然,审稿人要履行这项学术权利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他们不能只给出“肯定”或者“否定”的意见便了事。如果给出肯定意见,需要充分解释;反之,也必须给出否定的充足理由。所以,审稿意见的论述、论证也必须严谨、充分。审稿意见需要清晰地陈述所审作品做了哪些学术工作,评价作品的优点,评价作品的主要问题,列出作品的次要问题,以及对作品的推荐意见。直接录用、修改后录用、修改后再审、拒稿等最终意见也必须是建立在上述评审工作基础之上的。

在我国,越来越多的学术期刊逐步建立了较为规范的学术同行评审流程。这对提高学术期刊的整体发展水平大有裨益。但在多数情况下,审稿人往往给出“肯定”或“否定”的最终意见后,只肯草草写一两句评阅意见。甚至在有些情况下,只提供结论而并不给出具体的评价和修改建议。这样的评审虽然也能够一定程度上帮助期刊对论文质量的把关,但因此而产生的“误伤”也会达到一定比例。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评审程序对进一步提高作品的质量并无帮助。

为审阅稿件认真写出建设性的评阅意见,应当成为审稿人最基本的责任。只给出“肯定”或“否定”的意见,而敷衍对待评阅工作,属于只享受学术权利,却逃避学术责任的行为。如果审稿人工作繁忙,应当谨慎地接受评审任务,不应该勉为其难履行审稿职责。学术期刊更不应该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将同行审稿异化为仅仅走同行评审程序的表面功夫。如果审稿人只提供最终意见,而不认真书写评阅意见,经学术期刊提醒仍无改观,就不必再保留其审稿人资格。每一个严谨的学术作品都值得被认真对待。

在一个学术功利性氛围较重的环境当中,学术产出远远大于核心期刊的容量。即使是期刊初审环节已经筛除大量稿件,到达审稿人手中的稿件数量仍然十分可观。根据国际惯例,虽然审稿人一般不领取任何报酬,国内还是有少数期刊为了肯定审稿人的工作而支付少量审稿酬劳。审稿人不当因为审稿酬金微薄,就轻视评审意见的撰写。即使是最微薄的报酬也应当视为“例外”,不计报酬认真书写审稿意见应该成为“常态”。

审稿人应当独立、匿名评审,但审稿意见却应该有更加充分的讨论和互动。作者、审稿人和编辑之间应当就不同的学术观点、学术判断、稿件处理意见展开充分的思想交锋,在投审稿平台的记录当中应当蕴含更加丰富的学术价值。如果只是“收稿”“录用”“拒稿”“请另投他稿”等记录,会显得这种学术生产和学术互动过程相当贫瘠。

随着我国学者学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在很多学术规则上也应当更加全面地与国际接轨。一流的学术生产不仅仅需要一流的学者和一流的期刊,一流的同行评审也是一项必要条件。一流的审稿人不容易否决一个学术作品,也不轻易肯定一个学术作品。对作者而言,无论自己的论文被接收还是被拒绝,都会因为经历同行评审而赢得学术尊重,收获学术价值。这样的学术同行评审工作将是整个科学大厦的根基。

一流学术生产需要一流同行评审